

谭桂明——沙场建功勋 盛世树典范

谭桂明（1916—1981），原名福鑫，又名贵盟，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崖口村人。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中山县四区崖口乡支部书记，四区区委委员、书记，中山抗日游击大队、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逸仙大队队长和政治委员，挺进粤中主力大队政治委员，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一、第三团政治委员、政治部秘书长，中共新（会）鹤（山）县委书记，在中山等地领导和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1946年6月后任东江纵队北撤山东烟台干部连指导员、华东军政大学教导员、两广纵队第三团政治委员、华北军政大学干部南下工作队队长、中共珠江地委委员兼武装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珠江地委委员，中山县委书记、县长，中共粤中区委委员，佛山地委副书记兼秘书长、专员，惠阳地委副书记、专员，1968—1971年下放惠阳“五七干校”劳动，1971年后调任中共广东省统一战线办公室主任、省统战部副部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兼秘书长。1981年3月病逝于广州。

谭桂明1916年出生于上海，3岁时丧父，后回家乡崖口村随叔父生活。“九·一八”事变后，时在中山县乡村师范就读的谭桂明受进步教师影响，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与同学们一道积极参与募捐筹款支援东北义勇军抗日等工作。1934年毕业后曾留校当附属小学教师。

卢沟桥事变后，谭桂明积极投身到反侵略的民族战争中，由于表现积极，于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发动群众组织了抗日救亡工作团、战时服务团崖口乡服务支队、崖口乡抗先队等群众团体和四区抗日民众剧社等群众组织，到四区各乡村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吸收爱国先进青年入党，组织成立了崖口村党支部，他担任支部书记。

1938年广州沦陷，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谭桂明积极实施县委发展武装的计划，在组织更夫队的基础上，组建崖口乡警队。1939年夏，日军先后两次武力侵犯中山横门，谭桂明率领武装集结队开赴横门前线白米山一带，配合国民党中山县守备队抗击入侵之敌，取得横门保卫战胜利，大大鼓舞了中山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信心。

1940年3月6日，日军从拱北、唐家等分多路入侵中山，国民党中山当局和军队不战而退，谭桂明与崖口党支部率领乡警队在崖口村附近公路上英勇阻击进犯的日军，表现出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中山沦陷后，为发展敌后抗日武装，根据县委指示，他带领部分乡警队员转移到中山九区（今南头至三角一带），与长洲乡警队、驻九区的欧初小队汇合，成立党领导下的中山抗日游击中队，他任党代表。

根据敌情变化，1941年底，中心县委决定“经营番禺、发展中山、建立五桂山抗日根据地”。1941年10月，在县委委员谢立全指挥下，谭桂明率领第一、二主力中队采取远道奔袭的战术夜袭崖口伪护沙中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歼灭、俘虏驻崖口的伪军40多人，缴获武器一批，就地正法了仗势欺压百姓的伪中队长谭玉良，拔除了伪据点，赢得了民心为即将进驻五桂山的抗日部队解决了给养问题，促进了这一带抗日武装斗争的进一步发展。

谭桂明做思想政治工作有其独特之处。他深知部队的战斗力离不开正确有效的政治思想工作。因此，他总是根据部队的情况、特点和每个时期的任务来制定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对新入伍的战士，他首先进行人生观和队史教育，尔后，又不失时机对部队进行爱国主义艰苦奋斗教育和时政形势等教育，组织部队每周召开生活检讨会，在上下级之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谭桂明作风平易近人，与战士的关系十分融洽，亲如兄弟，战士有什么思想问题和实际困难他都主动与他们谈心。他经常针对部队存在的问题，联系战士的思想和生活实际，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讲政治课，讲得既生动又具体，战士们很爱听。他想方设法提高战士的文化水平，每逢周末或节假日，部队举行文娱晚会，他总是与战士同乐。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流传至今的“拍拍手，烧炮仗”的晚会开场节目，就是在抗战初期“抗先”队在中山西樵乡县立第七小学举行文娱晚会时，由谭桂明带头表演的。因为他是本地人，

会讲白话，诙谐有趣，鼓动性强，战斗前的动员多由他负责。战士们听了他的动员，信心倍增，斗志旺盛。他还十分重视抓战前练兵。例如，1944年9月第二次夜袭中山横门伪江防基地，部队要涉水通过一块水田。为尽量减低水声，防止敌人发现，战前，谭桂明认真组织战士进行涉水练习。他一边做低姿势前进的示范动作，一边喊“细声些，细声些，再细声些”，让战士们慢慢体会小声涉水行进的要领。由于战前练兵抓得好，因此，他带领的部队所参加的战斗，获胜利的居多。

谭桂明执行党的政策既坚决又灵活。1940年冬，中山沦陷不久，日伪军肆意横行，地方反动势力猖獗，关系错综复杂。崖口乡伪乡长谭日潮依仗伪护沙大队长谭本立和伪中队队长谭玉良的势力，串通当地上层人物郑卓、谭佩常，勾结起来拒交抗日军粮。谭桂明当时是中山抗日游击中队的党代表，经过与部队领导研究，决定采取镇压谭日潮，警告郑卓、谭佩常的区别对待的策略，派手枪组罗章有等人到崖口乡逮捕了谭日潮，押解到合水口村外枪决，并在其尸体上贴上字条，警告下任伪乡长，不得欺压群众，不得拒交抗日军粮，否则“格杀勿论”。同时对郑卓、谭佩常给予警告。由此，郑、谭两人不得不乖乖地答应交抗日军粮。崖口乡征粮局面的打开，除保证了当时部队的给养外，还为以后五桂山敌后抗日武装的粮食供给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42年至1944年，中山六区的斗争非常复杂。除驻有国民党六区区长卓君乙（后来投靠了日伪）外，还有伪密侦队长梁孔先、伪乡长梁鼎先。

“两梁”勾结驻唐家的日军对下栅乡“清剿”20多次，杀害无辜群众几十人。为给予日军和“两梁”这两个民族败类坚决打击，在谢立全、谭桂明的领导下，中山人民抗日游击大队连续几次袭击了驻唐家的敌伪军，对卓君乙先后四擒四纵，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使整个六区始终控制在人民抗日武装的手里。

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任中山县委书记，中山县县长谭桂明，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共产党员。党性强、立场坚定是他优秀共产党员的重要表现。他实事求是，坚持原则，勇于负责，显示出共产党人一身正气、敢于坚持真理的本色。1950年11月，由于操之过急，中山的清匪反霸、减租减息运动出现扩大化现象。海洲乡袁世根被戴上阶级异己分子、大恶霸、反革命分子、国民党乡长和骨干四项大帽子。中山县委常委对此案曾多次开会讨论。当时谭桂明任中共中山县委副书记、县长、法院院长。在讨论会上，谭桂明挺身而出，证明袁世根担任乡长是组织上的安排，袁世根以此公开身份作掩护来做党的地下工作，海洲乡政权是我党抗战时期成为“白皮红心”的重要地下据点，而且声明：“只要保留人头，给袁世根任何处分，我都同意”。然而，由于受“左”的认识影响，他的意见没有被县委常委会接纳，袁世根未能免于死。在海洲公审袁时，谭桂明不得不个人服从组织，违心地宣读了判决书。这件事使谭桂明终生内疚。真理终究战胜谬误。1981年12月23日，袁世根错杀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

谭桂明作风严谨，生活朴素，勤俭节约，克己奉公，堪称楷模。他喜欢吃冷饮，有时便自己动手做点雪糕、果冻等。他在香港的姐姐知道他的嗜好，打算送他一台电冰箱，被他婉言谢绝。后来他自己花人民币900元买了一台雪花牌国产电冰箱。买到电冰箱后，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的他没有动用公家的车去搬运，而是自己租了一辆三轮车，和孩子一起搬运回家。他心里总是惦念着与之同甘苦共生死的战友和群众，每年春节，他携带家人到佛山、中山等地向老战友和堡垒户拜年，向单位借用车辆都按标准交车费，公私分明，一点也不含糊。“堡垒户”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斗争环境极端残酷的情况下，觉悟群众舍生忘死、隐藏保护共产党干部和人民子弟兵的住房关系户，是保护和积蓄抗战力量的基地，一般都是共产党员或基本群众的家。

谭桂明对子女的教育和要求十分严格，做到言传身教。他说：“不贪污、不腐化这两条，人人都要做到。这两条做到了就可以吃碗安乐饭。”1980年，医生诊断出他患了肺癌，省领

导决定让其家人陪伴他到北京治疗。谭桂明和家人到了北京后，住在京西宾馆。可刚住下两天，他知道了每天要付住宿费 40 元，就对家人说，房租太贵了，我不能因个人觉得舒适就浪费国家的钱财，家人几次劝说都无济于事，仅住了 5 天，他们就搬出京西宾馆，住进了每天只收 4 元住宿费的北京市城建局招待所。在治疗期间，医生嘱咐他要多吃青菜，但招待所里的饭菜蔬菜很少，谭桂明不愿给公家增加开支，就趁着每天早上到天坛练习气功时，到附近摘点野菜来煮着吃。

谭桂明晚年病重期间，得知各地在征集党史资料，他预感到自己不久于人世，想抓紧时间写出中山党组织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峥嵘岁月和光荣业绩，可惜只写了回忆录的提纲，1981 年 3 月在广州与世长辞了。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谭桂明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赤诚为党、爱国勤政为民之心日月可鉴，特别是他坚持党性原则、不徇私利、追求真理的优秀品质，永远长存于中山人民心中，是当代共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学习的楷模。